

王曼老师 100 岁了。

我和她结识已逾 40 年。1977 年 12 月,我走进高考考场。1978 年 2 月,我成为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的一名学生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,命运已经悄悄给我安排了一位影响一生的恩师。

王老师在医院时有个响当当的名号——“严主任”。这个“严”不是凶,是严格——她对病历书写、手术操作,甚至查房时的站位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。

“妇产科面对的是两条生命,容不得半点‘差不多’,任何一丝松懈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”她每次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是盯着你的,让你知道这句话是说给你听的。

王老师是“文革”后第一批取得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导师。大学毕业那年,我如愿考上了王老师的研究生,1989 年拿到了妇产科学硕士学位。从此,她成了我医学路上的指路明灯,一照就是一辈子。

王曼老师正式的研究生有 6 个,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,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。值得一提的是,从她开始,到我们这一代,再到学生,学生的学生,已实现了“五代同堂”,桃李满天下。如此“薪火相传”,是师承,也是王曼老师的人格魅力使然。

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人

第一次听王曼老师讲她的身世,是在研究生刚入学不久的一个傍晚。她说得很平静,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可我听着听着,眼眶就热了。

她出生在浙江嘉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是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,母亲是师范学校的教师。本该是书香门第的安稳人生,却被战争碾得粉碎,父母相继去世,她小小年纪成了孤儿。战火没给她留下多少童年记忆,却留下了一个刻进骨子里的念头——学医。

她说,那时的想法很朴素:“人总是要生病,生病了总得有人治。”于是,她考入了贵阳医学院,师从李瑞麟、王季午、燕淑昭等名医大师,还选了妇产科这个“兼具外科利落与内科细腻”的专业。王曼老师常跟我说:“妇产科好,这一行离新生命最近。”

这句话,我记了一辈子。

1950 年,王曼从医学院毕业,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。前线的伤病员越来越多,医务人员严重短缺。没有犹豫,她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医疗队。出发前几天,她特意找到当时同在杭州的哥哥,拍了一张合影。她说,那是给家里人留的遗照。

后来,手术队没有奔赴前线,而是作为“后方”被安排在山东兖州。她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,进了外科手术队,在第 15 野战医院为从前线下来的大批伤员做截肢手术。

“白天做手术,晚上睡不着。睡不着就起来备课,给部队的医务人员上妇产科课。”王曼说。

当一个人心里装着别人的时候,再苦的处境也拦不住这个人心想做事。

1974 年,王曼被派往西非马里进行医疗援助。马里条件艰苦,当地妇女病的资料几乎空白。王老师白天看病,晚上就整理病历、做调查。她把妇产科日常的药名、病名、化验名用英、法、中三种语言列出来,留给后来的医疗队。

马里蚊子成灾。她晚上写东西时,不得不把电风扇开到最大对着腿和脚吹。她大腿关节的病根,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落下的。

我后来做生殖医学,每次在实验室熬夜、攻克难关的时候,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在马里开着电风扇做记录的王老师的形象。

许海峰在关键时刻打出平时水平



许海峰 侯俊珏 摄



王曼(前排左一)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合影。

我的百岁恩师 王曼先生

后来,我的学生阮恒超、黄夏娣、陆秀娥也先后援助马里。孰料马里突发改变,时局动荡。她们说,每当遇到困难,一想到王老师当年都能扛过来,就觉得没有什么还是挺不过去的。

在老同事们的印象里,王老师无论多疲惫,只要病人需要,她从从不喊累。她的儿子陈钢常说:“我妈妈心里只有病人和学生!”我每每听到这句话,都觉得“没错,这就是她”。

陈钢或许不知道,当年王老师怀孕七八个月时,还挺着大肚子站在手术台上。到了孕后期,她担心术中自己子宫收缩导致破水,就在白大褂口袋里放一盒黄体酮,每次手术前先给自己打一针,让子宫安静下来。就这样,一针一针,撑到了预产期。

我每次想起这个场景都觉得心疼,又感到震撼。

一个做事“顶真”的人

王老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,是刻在骨子里的“顶真”。

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领教这份“认真”的场景。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的“第一届大学生”刚进医院,身为院长的她亲自给我们制定了一套培养方案——吃住都在医院,周六才能回家住一晚,周日就得回来报到。这让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住院医师”。

我们私下里叫苦连天,觉得太不近人情。后来才明白,她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:临床医生,必须在病床边长大。

她查房时的严格更是出了名。患者的每一项检查,每一个指标,她都要求经管医生心中有数,能脱口而出且毫无差错。一次一个年轻医生被问到患者的血红蛋白数值,翻了翻病历才回答。王老师没发火,只说了一句:“病人躺在这里,她的命在你手里;你不记住她的数值,谁记住?”

这句话,我向她还重。

还有一次,我问她汇报“产妇 25 岁结婚”,她立刻打断我,严肃地纠正:“错了,是 26 岁!”我当时有点蒙,心想这也太较真了吧,25 岁、26 岁有多大差别?可她的表情告诉我,在她这里,没有“差不多”。她常说:“妇产科医生手里托着的是两

条命,马虎不得。”

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,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。那时论文是用方格稿纸手写的,改一遍就要誊写一遍。数据表述不够精准,要改;逻辑链条有跳跃,也要改。一处数据的偏差,一个论证的逻辑漏洞,都被她用红笔圈出来。她一遍遍地改,我一遍遍地誊抄。如此竟改了十几遍!废稿纸摞在一起,恐怕得数米厚。我后来常开玩笑:“我现在指纹锁经常按不开,肯定是当年誊抄太多,把指纹磨平了。”

论文答辩时,她更“顶真”了。为了确定答辩委员会成员,反复斟酌、几易其人。我觉得她过于操心,后来才明白,她的标准很简单,每一位委员都必须对我的课题方向有深入的了解,能在答辩时提出真问题,能帮我把研究再往前推一步,而不是“走个过场”。

正是这种“磨”,磨出了我骨子里的严谨。后来我做了老师,才真正理解她的“顶真”。医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,任何一个科学结论都必须经过推敲,容不得半点虚假与浮躁。从医数十年,无论是面对复杂的疑难杂症,还是主持国家级重大课题,我都要求自己做到极致。

同时,王老师也让我明白:真正的“托举”,不是替年轻人铺一条平坦的路,而是帮他们搭一座能走得更远的桥。

一个温润善良的人

王老师有一样特别让人敬佩的本事:她虽然“厉害”,但总能让身边所有人都感到舒服。

她医术好是出了名的,更出名的是她那种“让人心甘情愿跟着走”的凝聚力。我们这支队伍,无论彼此性格多不同、研究方向多分散,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。原因无他,就在于王老师凝聚着我们这群人。

出身知识分子家庭,王曼老师身上自带一种优雅和体面。

我的学生杨小福说:“王老师喜欢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,即使是冬天,也喜欢穿裙子。所以我每次去拜访她,都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。可能就是这种影响,我们团队的人都很注重仪表。”

去年我们去病房看她,她知道我们要来,早早上漂亮裙子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端坐着等我们来。我看到她,心里又酸又暖。哪怕在病床上,她也要以最好的样子面对学生。这就是她的体面,也是她对生活的尊重。

王老师治学严苛,待人却十分慈爱宽厚。我的师姐徐乐凤回忆起王老师,总是很动情:“每逢过节,老师总会热情邀请我们学生登门小聚。席间亲切闲谈、关怀备至,像家人一样牵挂我们的生活,让我们倍感温馨。”

这种“家”的感觉,是我们师门一直没断过的情感。这些年,我养成了一个习惯,每逢节假日就带着学生一起去看望王老师。如果身在外地,也一定委托学生代我前往。这于我而言,就像回家。

去年教师节,师门“第五代弟子”申雪知第一次见到“祖师奶奶”。回来后特别兴奋:“老教授特别儒雅,相处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。眼睛特别有神,整个人的神采奕奕。她握着我们的手,给我们讲以前的故事。聊起学生的时候,能看得出来她打心底里喜欢、疼惜自己的学生。”

王老师常教导我们:“要把病人当亲人。”这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,她懂得病人的每一分焦虑,也接得住家属的每一次慌乱。

我听师姐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一位妊娠四个月合并子宫肌瘤的孕妇,检查提示肌瘤较大需手术治疗,而一旦手术,胎儿很难保住。那天,满脸泪痕的孕妇被推向手术室,在走廊上恰巧遇到了王老师。王老师见她哭得伤心,问主管医生怎么回事。问毕她调来病历资料,站在走廊里一页一页地翻,一行一行地看。沉吟许久,她拍板决定:暂停手术,改保守观察。

她说,从肌瘤的大小和怀孕时间来看,胎儿仍处于正常发育阶段,可以暂时随访处理。几个月后,这位孕妇成功剖宫产,母婴平安。

我后来问她:“当时万一判断失误,可是要担责任的。”她说:“担责任的事多了,但不能因为怕担责,就眼睁睁看着病人失去孩子。”

这份医者仁心像一道暖流,流淌在我们五代同堂的血脉中。

我开始带学生后,常对他们说:“尽管去善

良。”这句话,被刻在了浙江大学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医学院校园的石碑上。每次路过那块碑,我都会想起王老师,想起她在走廊里拦下孕妇的那个瞬间。

一辈子温润善良的王老师,用一生让我们明白:医学不仅是治愈疾病的科学,更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撑、和谐共生的一门“人心”艺术。

一个守正创新的人

王老师的主攻方向是子宫内膜异位症,这是当年最困扰女性的疑难病之一。从 1982 年开始,她就担任全国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协作组牵头单位的负责人。

那是一个没有数据库、没有统计软件、连复印都靠手抄的年代,她硬是汇总了全国 8 个地区 1553 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病历,一条一条地分析,一页一页地整理。1986 年,她撰写的《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和诊治》发表于《中国现代医学》。1987 年,她主持完成的“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异位内膜特征与临床”系列研究获得了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。

她还带着团队研究电脑辅助诊断、异位子宫内膜的超微结构、雌孕激素受体、组织化学、超微细胞化学、药物对内膜细胞 DNA 合成影响……基础研究、临床研究,两手都抓,两手都硬。

那个年代,一个妇产科医生能做出这么系统的研究,靠的就是两个字——执着。

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王老师做了一辈子妇产科医生,从没让“妇产科”三个字把自己框住。

她总是鼓励我们拓宽视野,往外看。她说:“医学的进步,很少是在一条路上直直走出来的,多是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撞出来的。”所以她支持我们把基础医学和临床实践融在一起,把中医和西医的长处融在一起。在那个年代,能有这种眼界的妇产科前辈不多。

1979 到 1980 年,王老师干了一件在当时很“前卫”的事,当时很多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西药治不好、手术复发,走投无路。她就带着大家做研究,用醋酸棉酚做治疗实验,带领妇产科工作者搞中西医结合。一边在实验室里摸机理,一边在病人身上看效果。那时没有“转化医学”这个词,但王老师做的就是转化医学。

她让我明白,医生的眼光不能被科室的牌子框住。病人的病是全身的、系统的病,不能只从一个学科的视角去治疗。问题在哪里,眼光就要看向哪里。

后来我提出“配子源性疾病”理论,做的就是“跨界”的事——以前大家关心“试管婴儿”能不能怀上,我们则是关心孩子长大后会不会更早得高血压、糖尿病?这仅靠生殖医学回答不了,必须把遗传学、流行病学、生命早期编程的机制都用进来,才能找到答案。

把病人放在心上,把责任扛在肩上,认认真真做事,诚诚恳恳做人,这就是王曼老师。

2017 年 11 月,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电话打过去,她在那头停了两秒钟,然后声音一下子亮了起来,说了一句话,我至今一字不差地记得:“你以后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为人民服务了!”

那一刻我鼻子发酸。她高兴,不是有了“院士”学生,而是她的学生能在更高的平台上,继续做她当年在战地医院、在马里、在每一个深夜的手术台上的做事。

(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浙江大学医学遗传与发育研究院院长)

不是所有训练都越多越好

“他需要什么,你就练什么。”

许海峰说,自己练射击时,人们常说他刻苦训练。“我说句实话,我还真不刻苦,但我是用脑训练的。”

射击看起来动作不多。许海峰把它概括为“稳、瞄、扣”。

“稳是基础,扣是关键。”稳定,不是简单靠增加力量,不是给枪吊砖头,吊沙包就能解决。它需要长期训练,让手臂和身体的肌肉群变得协调。瞄准也不复杂。最难的是扣扳机:枪口会在靶心附近摆动,运动员要找到摆动的规律,判断何时进入最佳区域,在合适的时机完成扣发。

这是一种把“手感”拆开的训练思路。动作如何完成,肌肉怎样协调,错误出现在哪个环节,都要反复观察和验证。训练不是把时间堆上去,而是缩小“知道怎么做”与“能够做到”之间的差距。

从运动员变成教练后,许海峰把这种追问带进了训练管理。他曾在没有执教经验的情况下接手国家女子手枪队。面对一个传统优势项目,他没有立即安排训练,而是先花 3 天时间翻阅国内外比赛成绩单,分析国际国内运动员水平和队伍的实际差距。

许海峰先问自己:什么样的教练才算好教练?答案不是训练场上站得多久,不是喊得多么响,也不是自己够不够累。“运动员一比赛把水平打出来,你就是好教练。”许海峰说,“你每天累得半死,最后比赛没成绩,运动员没打出成绩来,你不是好教练。”

这句话很直白,却点出了不同层级教练的分工。基层教练要选材、教基本动作;省队教练要帮助运动员提高成绩;国家队教练面对的,则是比赛。

“到了国家队就是比赛。”作为教练,许海峰也取得了硕果。除了带出 1996 年奥运冠军李对红和 2000 年奥运冠军陶璐娜,作为射击队总教练,他率队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拼下 4 枚金牌。

心理不是一句“别紧张”

“有没有天赋很好,训练不错,最后却没有打出来的运动员?”面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这样的问题,许海峰回答得很快:“心理不好。”

他随即补充,这不意味着心理问题不可训练。技能项目会把心理波动放大。体能项目中,一个人能跑多快、跳多高,训练和比赛之间通常有较清晰的范围;技能项目不同,体操撑一次杠,射

击一次动作变形,差距就可能被拉开。

许海峰做教练时,常花时间和运动员谈话。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,中国射击队前几个重点项目接连失利,队内气氛压抑。一名即将比赛的运动员压力很大,觉得自己必须扛起全队的荣誉。

许海峰没有让她按原计划训练。他留出一天,带她边走边聊。运动员问:“教练,我是不是挺傻的?”许海峰回答:“你是挺傻。”

许海峰说的傻,是把所有责任都压到自己身上的“傻”。他告诉对方,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够了。

后来,这名运动员夺冠。

这并非许海峰一句“鼓励”的结果。他强调,心理调控必须落到具体目标上。越把“必须赢”挂在嘴边,越容易被结果压垮;越能把注意力收回到一发子弹、一次呼吸、一个动作,越可能把训练成果带到赛场。

科学不是取消经验

许海峰见证了中国体育训练条件的变化。过去,一个运动员通常只有运动员、教练员、管理人员和队医;今天,优秀运动员身边往往有科研、医疗、营养、康复等人员组成的复合型团队。

他谈到选材。过去,教练选人较多依靠经验,有时是“师傅带徒弟”的办法,科学依据不足。今天,更严格的选拔规则确保公开、公平、公正,也让更多人有机会进入视野。

不过,他不认为科学选材意味着不再需要经验。

“任何事有利有弊。”许海峰说。

规则越严格,教练凭长期观察破格选人的空间就越小。许海峰有过这样的经历:看到一个年轻运动员,有时会根据走路姿态、眼神和赛场感觉判断“这个人行”。这种判断未必能马上说清全部依据,也必须放到后续训练和比赛中检验。

科学不是用数据替代人,也不是把经验神秘化。对许海峰而言,科学选材是让判断更准确。从 100 个人中才能出一个顶尖运动员,到 10 个人中就能出一个顶尖运动员,选材的进步意味着更高的成功概率,也意味着更少的资源浪费。

一个人是否适合某个项目,要看先天条件,也要看训练、性格、心理和机遇。真正需要警惕的,是用一场比赛、一张成绩单,匆忙给一个人下结论。

当被记者问及人的极限是什么时,许海峰答得并不直接,但颇有许氏风格:“刚开始练一下就想拿世界冠军,那不现实。”